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哲学与文明的 当代视域

贺祥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 ●

哲学与文明的 当代视域

贺祥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域 / 贺祥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725 - 1

I. ①哲… II. ①贺…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311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邀编辑 邹莉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何艳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81 千字

定价 7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客观世界本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指导人类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继承者在解决不同时代课题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在指导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和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并且在继续影响 21 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

自 2005 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升级为一级学科以来，已经取得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这种发展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和开放性所决定，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所决定，更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任务所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湖北大学几代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在 2013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取得了前 1/3 的好成绩。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广大教师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中，近三年有两部学术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现在编辑出版的《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就是其中部分的研究成果。

2013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回顾 20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辉煌与坎坷，正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深感习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发人深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十分必要；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责无旁贷，任重道远；深感坚持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坚持学科发展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应该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方向。这里仅就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关系略作分析。

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应当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而没有很好地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科研实践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政治与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完全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总括着各种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法律形式，以及道德、宗教、艺术等思想观念现象。既然它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它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就其总体和本质而言，它不能不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对立，自然也就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现实存在的利益矛盾，必然会产生思想的、政治的分野。这是客观的存在。所以，不能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问题完全同政治割裂开来，但也不能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

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层次性，有的同政治的联系比较直接，有的则比较间接。更为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一经产生便获得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特殊活动规律。它的存在和发展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与制约，但绝不能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更不能用一种去代替另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思想界的主要偏差在于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夸大政治而贬低学术，用政治冲击学术，模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把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甚至把学术是非当作了敌我问题，用政治大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思想界存在的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扭转了这种局面，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春天。我们应该珍惜

这种变化。但是，也要防止出现忽视政治、使学术研究完全脱离政治的倾向。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是在国外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作为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武器的情况下，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只能使我们自己解除精神武装。“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坚守失败，教训十分深刻！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理论观点，如“告别革命”、“政治多元化”和宣传“私有化”等理论观点，都披着学术的外衣在极力扩散。当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哪一种不带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呢？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会危害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产生不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但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政治与学术问题，吸取 60 多年来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防止“左”的或右的偏向，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 21 世纪能够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衷心地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们能够辩证地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资政育人，努力提升学术影响力，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靳辉明

2013 年 11 月 18 日

自序

1

这部论文集收入本人已经公开发表的 46 篇论文，它们一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头一年写成，一部分是 2011 年至今年写成，而且都是对当代视域下的哲学与文明诸问题的思索，并自认为具有较强烈的当代性与针对性。这些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要范畴、命题、原理为选题，论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原理中的实践观、物质观、运动观、辩证法、认识论、真理观、历史观、广义生产力等原典基础理论，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根本方法、实事求是、经济哲学、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及西方哲学等问题作出了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当代价值的探索，其中的许多问题在当代都属引人思考、催人研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本书将这些论文收入后，作了两项统一处理：一是本着论题的鲜明性、简洁性及技术性要求，对若干论文题目作了修订，增添了一些副标题，并统一增设了文中小标题；二是对所有原发论文的引文及注释，或根据新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出校改与新注，或根据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作出新注。

这部论文集有个前生后世的问题在此必得作一说明，这就是本人曾从自己 1985 年至 2002 年初所发表的 70 余篇论文中选出 40 余篇，以《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为书名，由南海出版公司于 2002 年 3 月出版，当年出版公司规定由我自办发行，实际上未进入各书店公开发行。我将那本书主要是寄送给武汉地区几所高校图书馆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师长与同行，同时送给了我从教的湖北大学政教系与马列课部（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历届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近年书已送无所剩，但有新进学生找我索要，国内同行在相关同行家中书房见到此书，也找我索要，由此我决定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出版社的要求：一是书名不能完全相同；二是必须删掉原书一定内容，增加新的内容。由此，本人减下原书若干篇相对浅显或留有历史年代痕迹提法的内容。增加的新的内容中，既有被原书漏选的自认为有理论与现实价值的论文，又有2011年以来新写的论文。最后经商定，书名改为《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域》，这与本人的那部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论文集《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域》（收入自2002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40篇）相对应，可称为姊妹篇。

这部论文集所探讨的问题，至今仍有不少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及相关学科同人继续探讨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笔者对有些问题的继续探讨，这里不可一一分说。考虑到问题的连贯性，有关物质定义问题与制度文明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同《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域》那部论文集之间的学术联系，在此分别略加澄明。

2

本书第二章即“论物质及其运动”前三篇论文是对列宁的物质定义问题的探讨及对商榷者的回应，那时是运用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所作的探讨，阐明的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而且主要是在研读列宁1908年所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基础上所作的阐发，至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意义。笔者此后发表的《以实践思维方式重释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①一文，则是运用转换了的思维方式即包容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实践思维方式，阐明的是列宁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而且是在继续研读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同时，又研读了列宁1914年所著《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和1921年所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等著作的基础上所作的阐发，并继而发表了《列宁以两

^① 《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种思维方式阐发物质观的缘由之反思》^①一文。如同实践思维方式就是以实践为基础来接纳与包容、整合与阐明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等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一样，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并将实践观点作为核心观点来统领与梳理、整合与阐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以实践思维方式阐明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就不再只是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意谓，而是同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意谓的完整意义的物质定义，这反映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一以贯之的一条清晰可见的思想脉络，由此而作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谓的物质定义。这两篇论文我已收入《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域》那部论文集中，对物质定义的后续研究过程和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应用研究感兴趣的同人，可以去翻阅那部论文集的第一章即“实践思维方式若干基础理论研究”与第二章即“实践思维方式若干应用理论研究”共八篇论文。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并将实践观点作为核心观点来统领与梳理、整合与阐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以实践为基础抑或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基点并作为核心观点。通常人们都认同或不怀疑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是通常将其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不是从广义的认识论或哲学就是广义的认识论来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如果我们以实践为基础抑或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基点并作为核心观点，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两个“主义”及不可分割的基本原理中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些“主义”、“原理”不就是“认识”或意识、精神、观念、思想、理论吗？这些“主义”、“原理”即“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不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吗？应当说明，以实践为基础抑或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基点，并将实践观点作为核心观点来统领与梳理、整合与阐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就是这个基本思路，并集中体现在第八条提纲中，即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

^① 《江汉论坛》2010年第10期。

合理的解决”^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继续下来的也是这个基本思路，他们一方面指明实践“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时又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或者首先确认了“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②；另一方面指明这一哲学“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③。他们由此进而指明：“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④对这后一论述，有位学者抓住其中的“实证”一词，说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带有实证主义的意向，差不多给他们戴上实证主义的帽子。对此，这位学者却未去想想，现代实证主义者是否认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被实证主义者，这位学者也未去联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譬如前面提及的第八条，又譬如第二条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⑤。这两条乃至全部提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原意正解，即这一哲学理论来自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这一哲学的真理性又通过实践加以证明或以实践检验作为标准。在这里，我要劝劝这位学者不要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任意地拉向实证主义一边，不应“以非马解马”，而应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来返璞归真地“以马解马”，尽力避免“牛头不对马嘴”之理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77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④ 同上书，第73—74页。

⑤ 同上书，第55页。

3

本书第八章即“论制度文明”，是对制度文明理论所作的一个系列探讨，并与持“政治文明”、“体制文明”、“行为文明”等提法的学者从哲学层面上进行学术商榷。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与2001年先后提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①，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②（这其中将“体制创新”更替为“制度创新”）。根据这些提法，笔者于2001年底表明：“我们主张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第三个基本方面的科学称谓的学者，日夜向往与热切期望的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尽可能早一点地将物质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一并提出，并以此方针来指导‘三个文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要加速制度文明建设步伐，以此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③然而，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是“政治文明”范畴，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范畴。但是，无论是基于社会实践要求还是出自学理逻辑支撑，这先后提出又同时并存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都直接与间接地绕不开“制度”这个现实中介或中介范畴。

至此，笔者脑际环绕着一些由远而近的思想情节。首先是回望一个较远的思想情节。这就是我至今总是依恋并依据着党的十二大报告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个报告基于社会实践，认为人们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包括改造客观世界——自然界与社会两大领域和改造主观世界——精神领域，报告由此系统而明确地指出：“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

①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③ 参见贺祥林《实践·哲学·文明——〈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自序》，《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报告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① 这里除明确提出并界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与表现之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文明范畴，但是明确论到了制度文明的表现，其实质是“三位一体”的社会文明理论这个基本思路，而且这里所引述的第一句与最后一句，前句说的是制度文明的直接表现，后句说的是制度文明的间接表现，其后句“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实质上就是把制度文明确定为中介文明。

其次是一个较近的思想情节。这就是我近年热恋着党的十八大及其前后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一个新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有三个节点：一是党的十八大前夕，《人民日报》以其前所未有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制度文明的时代创新——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之三》^②，这是一篇具有独特意义的社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动态，既总结了制度文明建设成就又阐明了制度文明理论，笔者读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理论激动抑或心理冲动。二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时，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分别阐明了道路、理论、制度这个三位一体的基本内容，也阐明了道路、理论、制度的地位与作用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以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还特别强调“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③ 三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开头从回顾性总结性的视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是一个“六位一体布局”的表述——引者注），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② 《制度文明的时代创新——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之三》，《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5页。

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同时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接着又从前瞻性紧迫性的视角指明：“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进而明确规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接着分六段阐明了“六个紧紧围绕”，其中每个紧紧围绕都绕不开“制度”、“体制”、“机制”这三个词。^①在此，“六位一体布局”中的关键词是“制度改革”，“六个紧紧围绕”中的关键词也是“制度改革”，“三个自信”中第三个自信即“制度自信”，这必然都是建立在通过“制度改革”全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及其发展过程之中，而第三个自信即“制度自信”就是前两个自信的根本保障，这个根本保障的地位与作用，实质上是一种中介地位与中介作用。决定还明确规定了“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②这个总任务。决定还在第八部分与第九部分明确地将制度建设纳入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轨道^③，这里的关键就是强化了制度建设两个不可分割的核心向面。由此而来，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那个基本思路，到党的十八大前后这个一脉相承又有发展的新的基本思路，应当成为一个令各级党政干部、各个学科学者及全国各族人民深深思考的问题。

4

如果把问题说回来，我在完成收入本书第八章中的前九篇论文亦即对于制度文明理论作出最初的一些探讨之后，先是2002年，后是2007年，党先后提出了“政治文明”范畴和“生态文明”范畴。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页。

② 参见上书，第23页。

③ 参见上书，第46—53页。

说来有一巧，就在2002年下半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政治文明”范畴这个时间节点之先，即这年春夏之际，我沿其心路，撰写并发表了《邓小平制度文明建设理论的精华之篇——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①一文，还申报了“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这个课题并获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然而这个项目被我有意识或无意推迟，因为此后从学界到政界，总有人对制度文明的提法有微词冷言，不过这篇论文引起较好反响，如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邓小平理论》2002年第6期转载，并于2005年获评武汉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这说明从学界到政界还继续认可制度文明理论研究成果。

说来也有不巧，在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也撰写并发表了《我党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②一文，这就是表态肯定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范畴，特别是肯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是我党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这篇论文发表时有一段论点及论述被删除。这就是我在论到“报告阐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和实质所在”这一点时，我提出“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就确立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就是着重加强制度建设，也揭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质所在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亦即制度文明建设”，我进而提出“可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时，使用的术语最多的是‘制度’，其篇幅最多而论述最系统的，就是指明其重点内容在于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就是揭示其实质所在应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亦即制度文明建设”。我已将这两篇论文收入《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域》一书，并将后一篇论文的原有论点及其论述予以恢复，这都要感谢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加以保留。

说来还有一巧，在制度文明理论研究空间被压缩的境况下，我也就长达8年未作此事，转而是把时间投放在探讨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若干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问题上来。其有所获中最令我欣慰的是，由此找到了从事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全新思维方式，并适时应用于制度文明

^① 《理论月刊》2002年第3期。

^②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4期。

理论研究，于2011年撰写并及时发表了《实践思维方式与制度文明研究》^①一文。这篇论文同样引起较好反响，如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哲学原理》2012年第1期转载。这篇论文收入本书第八章列为最后一篇，恰好成为不同于前九篇的一个界碑，它标志着本人从此进行的制度文明理论研究转换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从学理逻辑上力求提升制度文明理论研究的水平。

对于制度文明理论问题的态度，我仍然执持这是一个“引人思考、催人研讨”的学术问题，又有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全面贯彻，当下似乎让我步入如同屈原所言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境，至此我想简略透示一点近期的思考或求索心得。这就是：我党关于社会文明理论的基本思路，同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即“六位一体布局”、同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的“六个紧紧围绕”，都是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同时又是相互依存或相互贯通的。我认为，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实质上形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这个社会文明“三位一体”的基本思路，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个“三位一体”的新的基本思路，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从总体上或最抽象的高度作出的概括，具有很强的学理性与逻辑性，而且这同其事业布局与紧紧围绕的东西又不矛盾，前者包容乃至可以整合后者，前者具有收敛性，后者具有发散性，其“六位一体布局”与“六个紧紧围绕”，是我党的执政布局或执政纲领，需要具体鲜明、分别把握，需要便于操作、分路推进。在这种总与分之包容与整合面前，我主张社会文明的基本类型还是以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为最佳。梳理与整合其“六位一体布局”中相对应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无疑是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基本类型相对应的；而“生态文明”可包容在或整合于物质文明这个基本类型之内，亦即物质文明包括物质生产的进步——物质生产文明、物质生活的改善——物质生活文明、生态状况的良好——自然生态文明（或物质生态文明）等三个类属的内容；“政治文明”和“党的建设”中的制度方面都属政治制度文明，可包容在或整合于制度文明这个基本类型之内，亦即制度文明

^①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

包括经济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文化制度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外交制度文明等多个类属的内容；至于有些学者针对“社会建设”相应提出“社会文明”，或又称“小社会文明”，这就与总体上的“社会文明”的提法，存在着一个学理上的悖论或逻辑上的子项相容的矛盾问题。其实我党关于社会建设的内容，就是当前需要专门独立出来放到特别突出位置来加以解决的几个具体民生问题，从学理逻辑与现实把握的统一来看，都可将其中的具体民生问题归属到相关文明的基本类型之内，如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社保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问题就可归属到物质文明这个基本类型之内，而教育问题就可归属到精神文明这个基本类型之内。这都绝对不会妨碍我党关于“六位一体布局”与“六个紧紧围绕”执政理念的践行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如此等等，都需要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整合与论述论证，不可能由这篇序言所能企及。在本序结尾之时，我还想说的最后一句，就是上列侧重言到与本书相关的物质定义问题与制度文明问题及相连贯的其余理论问题，期望都能成为“引人思考、催人研讨”的理论问题，我也真心欢迎学界同人对其其中的一些浅见，作出批评与指正。

贺祥林

2014年7月26日至28日

于武昌沙湖琴园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论哲学基点问题	(1)
一 略论哲学的社会功能	(1)
二 实践释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	(4)
三 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12)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创新性和批判性	(17)
第二章 论物质及其运动	(22)
一 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的逻辑解析	(22)
二 再论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 ——答周久义同志	(30)
三 三论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	(36)
四 论思维运动及其多重意义	(39)
第三章 论辩证法与认识论	(49)
一 从一总三分的视角掌握《自然辩证法》	(49)
二 偶然性是“可以不出现”的东西吗	(63)
三 马克思主义认识源泉观新探	(65)
四 试谈真理的定义	(71)
第四章 论实践的唯物史观	(78)
一 关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思考	(78)
二 略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构成内容	(88)
三 在实践基点上全面辩证地掌握国家的本质	(92)